

國內郵資已付  
中華郵政北台  
字第 7502 號  
執照登記為  
雜誌交寄

(限向郵局窗口交寄)

雜誌

153期  
中華民國一一年四月  
第一五三期

March 2025 NO.153

# 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 中國大陸研究教學通訊

## 目 錄

### 專論

- 1 與習近平治下的中國共處  
——為何要認真對待黨的意識形態  
■ 齊慕實

- 9 近期中日高層互動觀察  
■ 何思慎

### 研究札記

- 14 中國科學技術史的回顧與前瞻  
■ 王良能

### 活動紀實

- 16 第八屆【後西方國際關係：全球南方與關係理論】  
冬令營  
■ 周燕

### 碩博士論文資訊

- 18 112 學年度碩博士論文

# 與習近平治下的中國共處 為何要認真對待黨的意識形態\*

齊慕實 / 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本文擬就中國共產黨意識形態及其對公共參與的根本面向，提出一些思考。本文認為，這些面向，構成了當前政策問題與基本事實的重要基礎，因此也對於此次會議的目標——理解目前中國的現況與影響力，以及加拿大與其夥伴如何提出因應——至關重要。

近年來，中國的「戰狼」外交官與西方的「對中鷹派」成員在彼此對話時，往往彼此各說各話，沒有交集。倘若我們想在與中共談判時，能夠更有力而有效地傳達本身的關切與利益，就必須設法設身處地的去理解中共的「黨式語言」(party language) 所設定的表達方式與接收處理外來資訊的模式，從而使我們的論述更易讓對方理解。唯有進行這類論述上的接觸 (discursive engagement)，才可能提高相互溝通和妥協的可能性，並減少無謂的摩擦與挑釁。

本文主張的核心觀點是：在習近平時代，我們必須認真看待中國共產黨的意識形態，因為中共當代治理的本質，就是所謂「意識形態治理」(ideological governance)。此種概念是指，政府本身扮演一種「教化型國家」(pedagogical state) 的角色，而以透過教化人民，作為保障秩序與促進繁榮的主要手段。這種教化是透過一群經過認證後具備資格的「轉化型官僚」(transformational bureaucrats) 所掌握的思想體系，來推定進行。若能妥為運用這套體系，則可為被統治者帶來福祉與和諧。此種治理模式必須避免來自其他政治實踐形式的干擾與競爭，而獨佔在中國政治體系中的必要性與正當性。<sup>1</sup>

那麼，這種「意識形態治理」(ideological governance) 在最高層級究竟呈現出什麼樣貌？我們可以從習近平本人的話語中窺見一二。2018 年 12 月，在「改革開放四十週年」慶祝大會上，習近平曾清楚表示：

「黨政軍民學，東西南北中，黨是領導一切的。正是因為始終堅持黨的集中統一領導，我們才能實現偉大歷史轉折、開啓改革開放新時期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新征程，才能成功應對一系列重大風險挑戰、克服無數艱難險阻，才能有力應變局、平風波、戰洪水、防非典、抗地震、化危機，才能既不走封閉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幟的邪路，而是堅定不移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堅持黨的領導，必須不斷改善黨的領導，讓黨的領導更加適應實踐、時代、人民的要求。在堅持黨的領導這個決定黨和國家前途命運的重大原則問題上，全黨全國必須保持高度的思想自覺、政治自覺、行動自覺，絲毫不能動搖。」<sup>2</sup>

---

\* 本文係作者於 2025 年 2 月，在社科院中國大陸研究中心，和加拿大駐臺北貿易辦事處、加拿大凱格瑞大學公共政策學院 (School of Public Policy, University of Calgary)、中華民國外交部、加拿大亞太基金會 (Asia Pacific Foundation of Canada) 共同主辦的「印太區域安全學術研討會」(Regional Security in the Indo-Pacific: Dialogues among Canada, Taiwan, and Regional Partners) 所發表的會議論文。

<sup>1</sup> Timothy Cheek, “Xi Jinping’s Counter-Reformation: The Reassertion of Ideological Governance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30: 132 (2021), 875-887.

<sup>2</sup> 習近平，〈中國共產黨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徵〉，《求是》，2022 年 14 期。

---

習近平的政治工程，目的之一，是試圖回應中共治理中國過程中長期積累的結構性政治問題，同時處理政治、經濟、社會與環境等當前的緊迫挑戰。他企圖透過削弱區域與地方權力，來恢復中央中共與國家機構的治理能力；透過遏止國有企業利潤過剩所造成的財政流失，以及貪腐菁英的大規模掠奪行為，來堵住財政漏洞；並透過建立以公共服務為核心、內容具體可衡量、報酬豐厚的集體制度行動（group élan），來重建中國共產黨在他上任時搖搖欲墜的統治正當性。

為實現這些目標，習近平動用了一套自 1940 年代以來中共慣用的標準行政工具。其中之一，也就是被官方媒體大力宣傳為「群眾路線運動（mass line campaigns）」的整風運動（rectification campaigns），而這也是習的三大政治議程之一。群眾運動實際上還帶有重新啟動並驅動其他兩大支柱（軍事與安全力量、以及黨國體制的組織動員力）的作用。

中共的意識形態治理，有其歷史脈絡。從 1940 年代延安整風運動，一直延續到今日習近平時代的種種運動和機制。這種「教化型國家（pedagogical state）」的型態，在明清兩朝，皇帝所頒布的《聖諭》中已有所體現，並透過「鄉約」制度在村落層級傳播其諭令和規訓。這種政治生活的樣態，於 20 世紀中國不同政權下持續演變，從未停止。中國歷屆政府至今皆共享的一項核心治理方式，便是所謂「訓政」，亦即政治教導或政治訓育。這正是孫中山延後民主實現的理論依據，也是他領導下之國民黨所體現的「教化型國家」之主要表現。作為中華民國的奠基者，孫中山至 1920 年代已認為中國人民尚未準備好迎接民主，因此必須先經歷一段由一黨所引導的「政治訓育」時期，使民眾得以內化現代文明的規範。John Fitzgerald 在其探討孫中山政治模式的研究中，將這種制度稱為「教導型國家（Tutelary State）」<sup>3</sup>，其目的是喚醒中國人民，教導其如何成為現代公民。1943 年，蔣中正在《中國之命運》一書中，也呼應了這種教化目標。

自 1940 年代以來，構成中共政黨實踐之最直接、最具體傳統者，則是「整風政治」（rectification politics）。此一傳統始於 1942～1944 年的延安整風運動，其後中共幾乎持續不斷地推動各種政治運動。整風政治常被視為毛澤東式的治理模式，與激進破壞性的政治運動相連結，但其實整風同樣源自劉少奇與其他黨內菁英，而不僅僅是毛澤東。更重要的是，整風政治不只是大規模群眾運動的特徵，它同時也構成中共常態性的核心運作方式。<sup>4</sup> 整風政治的核心，在於當人的意志受到一套優越的教條所影響、改造與規訓，並由受過訓練的幹部加以貫徹執行時，其意志能夠居於主導地位。這種治理方式無須透過選舉式的民主，其所要求的，是一種「經整飭過的政治領導」。這套主張，以及中共所宣稱的「黨務即為高貴志業（Party service as a noble vocation）」，體現在 1942 年的《整風文件》當中。

其中最核心的要素，自然是毛澤東本人的意見，其代表性文本包括《整頓我們的學風》和《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等。但在《整風文件》中，劉少奇、陳雲等黨內領導，也詳細闡述了整風的操作技術與管理方式。劉少奇的《共產黨員的修養》演講，堪稱中共主張「知識分子為意識形態服務」的代表性論述。劉在開頭便指出「共產黨人為什麼要進行修養」。這種改造的關鍵，即是每個個體的「思想意識」。劉強調，這一切之所以必要，是因為「共產黨是無產

---

<sup>3</sup> 孫中山先生最初是在《建國大綱》中提出此點，請見 John Fitzgerald, *Awakening Chin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79; Cheek (2021).

<sup>4</sup> Frederick C. Teiwes, *Politics & Purges in Mao's China: Rectification and the Decline of Party Norms*, 2<sup>nd</sup> ed. (NY: M. E. Sharpe, 1993).

---

階級的政黨，除了無產階級的解放之外，沒有任何自己的利益」。<sup>5</sup>

我們可以將此稱為「大寫的意識形態 (Big “I” ideology)」——也就是由國家權力所強制推動的具體、正式政治路線。它與中國社會中所普遍存在的基本或通則性共識（即「小寫的意識形態」 small “I” ideology）部分相異，有時甚至產生張力。

二十年前，「小寫的意識形態」是所謂的「活的毛主義 (Living Maoism)」，即 Heilmann 與 Perry 所稱的「毛主義的長尾效應 (the long tail of Maoism)」——仍在當代中國社會與政治生活中延續運作的毛時代遺緒。<sup>6</sup>「大寫的意識形態」則體現在中國共產黨的官方宣示中，例如習近平的言論與 2021 年的《歷史決議 (Historical Resolution)》。這類意識形態不僅塑造政府運作與公共言論，亦對中國對外關係產生深遠影響——決定了我們所接觸的中華人民共和國 (PRC) 官員在正式層面上能對我們說什麼、又期望我們表達什麼。「歷史的教訓」自習近平上任以來，一直是他思考的核心之一。2013 年 1 月，他甫就任中共中央總書記不久，即召集新一屆中央委員會領導幹部舉行學習會，主題正是「歷史的教訓」。習近平在會強調：

「蘇聯為什麼解體？蘇聯共產黨為什麼垮台？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意識形態領域的激烈鬥爭，導致對蘇聯歷史和蘇聯共產黨歷史、對列寧和史達林的全盤否定，出現了『歷史虛無主義 (historical nihilism)』，結果思想混亂、各級黨組織喪失作用、軍隊不再受黨的領導，最終蘇共四分五裂，蘇聯這個社會主義國家也分崩離析。」<sup>7</sup>

這場「黨史學習教育運動」最終在 2021 年 7 月慶祝中共成立百年的活動中達到高峰，並以當年 11 月中共中央第十九屆六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黨的百年奮鬥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畫下句點。過去十年來，習近平領導核心的多項作為，若從這段「歷史教訓」來看，便顯得合情合理：控制意志，控制武裝。習近平全面主導重組了解放軍領導體系與政治控制，將權力進一步向中央軍事委員會進行集中，尤其集中於軍委主席習近平本人。六中全會所通過的《歷史決議》傳遞的訊息重點在於：黨的歷史是「光輝燦爛的百年歷程」，而「歷史是最好的老師」，可指引黨「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顯然，習近平希望幹部們能夠「總結歷史經驗，把握歷史規律，增強我們開拓前進的勇氣與力量」。<sup>8</sup>

自 2013 年以來，透過持續的經濟增長、軍事擴張、紀律整肅與決策方面的中央集權化，習近平為首的中共領導班子已穩固了其硬權力，因此近年來逐漸強化其軟權力。<sup>9</sup>《歷史決議》針對黨內潛在的質疑——權力高度集中與對最高領導者的歌頌，未必是建設黨與強化中國的最佳

---

<sup>5</sup> 劉少奇，〈論共產黨員的修養〉，收錄於《論黨》(n.p.：大眾書店，1977)，translated in Liu's Selected Works as "How to Be a Good Communist"，<https://www.marxists.org/reference/archive/liu-shaoqi/1939/how-to-be/>.

<sup>6</sup> Sebastian Heilmann and Elizabeth J. Perry, eds., *Mao's Invisible Hand: The Political Foundations of Adaptive Governance in China*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11).

<sup>7</sup> 〈為什麼要學黨史，習近平總書記這樣講〉，《求是網》，2021 年 1 月 29 日，[http://www.qstheory.cn/zhuangqu/2021-01/29/c\\_1127042872.htm](http://www.qstheory.cn/zhuangqu/2021-01/29/c_1127042872.htm).

<sup>8</sup> 〈習近平：在黨史學習教育動員大會上的講話〉，《求是》，2021 年第七期（2021 年 3 月），[https://www.xuexi.cn/lgpage/detail/index.html?id=6485440031091197438&item\\_id=6485440031091197438](https://www.xuexi.cn/lgpage/detail/index.html?id=6485440031091197438&item_id=6485440031091197438).

<sup>9</sup> Joseph Fewsmith, “Reviving Leninism and National Rejuvenation: Can Tighter Cadre Control Produce Better Governance?”, *Party Watch Annual Report 2019*, pp. 5-12; and John Fitzgerald, “Cadre Nation: Territorial Government and the Lessons of Imperial Statecraft in Xi Jinping’s China,” *The China Journal*, No. 85 (January 2021), pp. 26-48.

---

方式——提出強硬地回應：任何政治異議或反對意見，將被定性為「不忠與背叛」，這也使得此一決議形同訂下了公共論述當中的禁忌和規則。

而這種貌似歷史關懷，實為政治掛帥的作法，在社會主義國家是司空見慣。對於列寧式政黨（Leninist parties）而言，掌控歷史敘事自馬克思以來就是一種核心任務，而自史達林 1930 年代推出權威性的《蘇聯共產黨簡史（Short Course）》後，這一傳統更為確立。史達林的《簡史》明確劃定了歷史中的勝者與敗者、「正確者」與「反革命分子」，以鞏固他在與托洛茨基及其他布爾什維克領導人鬥爭中的正統地位。而中共中央所通過的歷史決議，就如同由革命菁英所完成的、經過「同儕審查」與「認證」的科學研究成果，其成果形式就是一條新的政治路線，藉此揭示世界運行的新規律。毛澤東在 1945 年的所謂中共第一次歷史決議中，確立其革命路線；鄧小平在 1981 年的決議中，則拼湊出其改革開放路線；而習近平在 2021 年宣示了其所謂的「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路線。這些所謂歷史性文件，乃是中共對其政策、目標與方法所進行的週期性校準行動的體現。

當前這波「黨史學習運動」以及《歷史決議》的實質內容，聚焦於「團結」與「意識形態」。<sup>10</sup> 2021 年的決議，其標題為：《關於黨的百年奮鬥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而非如前兩次歷史決議那樣，針對「歷史問題」作出定性。換言之，這份新的歷史決議不是在「處理問題」，而是在「展現成就」。在整份決議與黨史教育運動中，有兩點特別值得注意：一是關鍵行為者的設定，二是文化（亦即思想、信念與意識形態）的角色。值得強調的是，這些文件中的關鍵行為者，其實並不是習近平個人，而是「中共中央」（通常是指中央委員會）。根據六中全會的公報與《決議》本身：「中央委員會全面貫徹黨的基本理論、基本路線、基本方略，統一領導推進偉大鬥爭、偉大工程、偉大事業、偉大夢想。」然而，這種「集體主體」的焦點，往往在國際上對於中國大陸的論述中，被關於習近平個人權力的討論所屏蔽。但若回顧中國共產黨的正式記錄，至少自 1927 年以來，由黨的各級委員會，特別是「中央委員會」所通過的決議，始終是決定政策走向、解決政治爭端、制定所謂「不可為與當為之事」的準據。至少在黨的正式宣示中，其核心決議仍維持著由「中央委員會及其決議」所體現的「集體領導」的理想。

另一個值得注意的主題，是「文化」的角色。習近平的言論以及六中全會的公報，皆呼應了整場「黨史學習運動」的主軸——「思想與信念至關重要」。也正因如此，習近平與作為其幕後重要文本創作者的王滬寧，都一再強調所謂「初心」、「自信」與「信念」等主題，並嚴厲批判所謂「歷史虛無主義」以及任何異端言論，藉以打造一套統一的「軟體系統」，來推動其改革工程。

王滬寧如今已位居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是具有實權的正國級領導人。他自江澤民、胡錦濤時期以來，便在黨內體系中步步高升，最終躋身權力核心。針對王滬寧對中共理論與意識型態的影響，曾有評估指出，王始終關注「文化的力量」——亦即由信念、認同與意志所構成的思想習性——對政治結果的塑造作用。事實上，王之所以強調文化與信念在政治中的作用，與他早年研究美國政治思想以及 1980 年代赴美訪學的經驗密切相關。<sup>11</sup>

---

<sup>10</sup> 〈中國共產黨第十九屆中央委員會第六次全體會議公報〉，<http://politics.people.com.cn/n1/2021/1111/c1001-32280048.html>.

<sup>11</sup> Matthew D. Johnson, "Securitizing Culture in Post-Deng China: An Evolving National Strategic Paradigm, 1994-2014," *Propaganda in the World and Local Conflicts*, 4(1) (June 2017), 62-80.

---

作為中共意識形態重要基礎的馬列主義和辯證唯物論，實際應用在蘇聯與中共的實際發展過程中，往往體現在不同歷史階段，其所面對的「主要矛盾」與「次要矛盾」，如何區辨與判斷。面對不同階段的不同形勢，蘇共和中共藉助於對「主要矛盾」的重新界定，由黨內的機制予以定調，就可以在所謂統一戰線的指導原則下，改變方向、逆轉政策，甚至推翻過往做法，而不致破壞其理論一致性與政治正當性。中共歷史上最明顯的兩個例子，第一次是 1920 年代末至 1940 年代中葉，中共放棄以無產階級為主體的城市革命，轉而進行與蘇聯模式不同的農村革命。第二次是毛澤東死後，中共領導層放棄了國內階級鬥爭與文革的路線。這兩次「主要矛盾」的修正，都是經由中共中央委員會的決議，予以正式確認，前者表現為 1945 年的《第一次歷史決議》，後者表現為 1981 年的《第二次歷史決議》，以及 2002 年 11 月第十六屆中央委員會所通過的「三個代表」理論。前者為毛澤東的革命正統性提供了理論依據；後者則向黨員解釋，為什麼如今能允許原先作為共產主義主要打擊對象的資本家（此時被重新詮釋為「代表先進生產力的企業家」），加入共產黨。

這種靈活性也擴展到中國的對外關係中，已往使中國共產黨得以在抗日戰爭期間與其主要政治敵人國民黨，以及主要階級敵人地主與資本家，進行合作（顯然當時日本的侵略被界定為主要矛盾）。到了 1970 年代，則表現在毛澤東於 1972 年 2 月會晤美國總統尼克森，形成了中美之間震驚世界的抗蘇合作關係。來到當前的大國關係，則如 William Callahan 所指出，這套戰略三角與中共的統一戰線邏輯，同樣有助於解釋當前中俄之間的「戰略夥伴關係」——只不過這次的目標是「孤立美國」。<sup>12</sup>

這種靈活性與「變化」，其實是一種「不變」——這實際上是一種「政治正統」(political orthodoxy)，也是中共長期奉行重複的「公開台詞」(public transcript)。更深入地來說，其實和西方歷史上的天主教會，甚至當今全球的自由民主社會，都有共通之處：人們對於理想的虔信(piety)，往往與對其濫用或虛無的態度，是共生共存的。共產主義價值的公開宣示，在中共內部其實是一種公開的台詞，有助於在執政菁英之間建立身份認同與政治忠誠。正如 James C. Scott 所言，這些公開台詞，與威權政體下的「潛台詞」(hidden transcripts，也就是沉默的不服從與抗爭)，同樣具有強烈的政治作用。<sup>13</sup>

然而，儘管中共藉由歷史來解釋與合理化政策的作法，至今仍持續不輟，中國的現實條件卻已與二戰結束前夕，以及 1980 年代改革開放初期，發生了劇烈變化。這些變化顯示，習近平領導下的中共中央將面臨更大的挑戰。當前這一輪重新塑造如何理解歷史的話語和台詞，無疑仍試圖達成其前兩次歷史決議所欲達成的目標：消弭高層領導分裂、在全黨中貫徹政策偏好，以及動員全黨與群眾支持習近平的意識形態治理路線——統一思想、壓制異見、激發對「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信心與自發性行動。但是，這些作法如今未必能收效，原因之一是過去多年來，中國本身也已深受全球化的影響：國內市場對外開放，以及中國人大量前往全球各地旅行、留學、經商與移居，來自全球的資訊流通與人口移動使得中國社會比過去更為多元化。<sup>14</sup>

---

<sup>12</sup> William A. Callahan, “Geopolitical Geometries in China-Russia Relations,” *LSE IDEAS: China Foresight Forum*, October 27th, 2022: <https://blogs.lse.ac.uk/cff/2022/10/27/geopolitical-geometries-in-china-russia-relations/>.

<sup>13</sup> James C. Scott, “The Public Transcript as Respectable Performance,” in *Domination and the Arts of Resistance: Hidden Transcript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0), 45-69.

<sup>14</sup> 劉擎，〈中國語境下的自由主義：潛力與困境〉，《開放時代》，2013 年第 4 期（2013 年 4 月），106-23。

---

同時，習近平與中共所面對的其他國內挑戰也很多：經濟不平等有增無已、環境品質持續惡化、黨國體制中根深蒂固的體制性貪腐，以及在軟實力方面遭到國際上廣泛的負面評價。

當然，不能否認的是，當前中共領導層仍擁有能處理上述挑戰的龐大資源：強大的經濟體系、受過良好教育且高度服膺工作倫理的社會群眾、經過具公信力的國際民調所顯示的廣泛社會支持、有效運行的官僚體系，以及一套具有震懾作用的警察與國安體系，用以壓制潛在挑戰者。然而，中共將面對上述挑戰，最受到矚目的近期「解方」，卻是一份《歷史決議》。這件事本身，就說明了中共政權的根本性質：在面對敵意升高的國際環境時，它選擇的是列寧式的紀律控制，而非選舉或擴大公眾參與；是意識形態治理，而非司法獨立；是對社會的全面控制，而非促進公民社會組織發展來因應社會需求。

以上論點，著落在所謂「大寫的意識形態」層面，接下來轉向「小寫的意識形態」(small “i” ideology) 層面。這裡指的是，中共官員與其他民眾在家中，或者與親友之間互動所產生的話語。<sup>15</sup> 也就是說，中國的「國內政治場域」——中共官員所工作的官僚結構，以及其所生活於其中的社會、經濟與法律制度——本身就是在中共意識形態治理體制下被創造並不斷再生產出來的產物。這些條件具有現代性，但處理這些條件的方式，則是由黨來形塑決定。這些基本特徵大致包括一黨統治、法律救濟的有限性、民族主義的易變性，以及被動的犬儒主義。但我認為，值得特別強調的是 Michael Szonyi 所稱的「被治理的藝術」(the art of being governed)。當前需要考慮的是，這套體系在後疫情時代，以及川普 2.0 所強化的國際敵意氛圍中，是否以及如何產生變化。

那麼，這種活生生的、社會性的、個人層面的「小寫的意識形態」有哪些特徵？過去七十年來，「政治上的毛主義」(political Maoism) 創造出了某些社會實踐與深層的思維習慣。而官方的毛主義意識形態，以及國家社會主義制度下延續至今的思維習性（如預設、價值觀、推理方式），二者共同構成了「毛主義下的實存歷史」(living history of Maoism)。此一實存歷史形塑了中央領導層制定改革政策的方式、地方官員與企業領袖在地方層級實施改革的方式，以及普通民眾實際體驗這些改革的方式。這套實存歷史的運作機制非常複雜；官方意識形態雖已不再享有廣泛信仰，而且對中共言論的犬儒態度(cynicism)也極為普遍，但這種實存歷史仍然透過提供一套參照語言的模式，深刻塑造了公共辯論與對話的框架；黨內知識分子、各路改革派人馬，甚至異議人士，依然大量使用毛澤東思想或其變體（例如習近平思想）中的語言與觀念，作為參與公共政策辯論的工具。國家社會主義的社會結構，以及這些結構所形塑的生活方式，即使早已在內涵上發生重要變化，仍然在形式上持續影響著日常生活。例如，戶口制度與單位制度至今仍在塑造資本主義企業的運作方式。儘管這兩種制度已往較為壓制嚴苛的層面已所剩無幾，但取而代之的卻是市場經濟帶來的不安全感與不平等。更根本的是，在 1966 至 1976 年文革期間，這段破壞性的十年中，所形成的思維習慣與公共生活實踐，至今仍深刻影響著多數中國人的表達方式與政治預期——對知識分子的殘留尊敬，以及重大問題最終由國家出面解決兜底的期待，與不容異見的論述方式和不自由的公共抗議型態相互糾纏，其影響所及，甚至能塑造批判中共統治，主張民主改革者的寫作與行動方式。

---

<sup>15</sup> 此處關於小寫的意識形態概念，引自 Clifford Geertz,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3), 193-224.

---

就政治言論與政治行動之間相互影響的部分而言，毛澤東時期所內化的一項潛規則，在習近平執政期間被更加強化，那就是：「只和黨對話，而不和其他人對話」(talk to the Party and not anyone else)。其結果之一，如同唐文方（Wenfang Tang）的調查研究所顯示，是當中國的公民、知識分子或社會行動者並未彼此爭鬥時，他們的對話對象就是中共的黨國體制。<sup>16</sup> 這種現象既源於歷史習慣，也出於現實考量。如前所述，中國共產黨不容忍任何不在其掌控下的重大社會組織或群眾運動的存在。此外，一般的勞動大眾普遍認為，解決問題是「領導」的責任，至少也應由獲得官方認證的知識分子來完成。知識分子在提出建言時，往往以黨的意識形態平台為語言框架，或至少會小心避免與黨的路線發生明顯衝突。廣義上而言，他們本身也往往是以某種形式為黨國服務——不論是在大學、科學與社會科學研究機構，抑或在重要國營產業中任職。這種「公民社會的國家導向」(state-orientation of civil society) 則讓西方觀察者常感困惑，因為他們總是預設在中國會出現如同西方社會中個體民主行動。也在其研究或論述中指向此種趨勢的普遍化，但迄今為止，中國的「生活經驗」、「知識取向」，甚至「商業實踐」（例如：在缺乏法律保障下，企業經營者往往其實是依靠與地方官員的共謀，才能求得生存）——這一切呈現的都是與黨國體制的「合作」，而非「對抗」。

但在此基調之下，當然仍有來自民衆的對抗行動。帶有暴力性質的個別或群體性事件，例如示威、襲擊企業或地方官員，甚至聚衆騷亂，都時有所聞。但重點在於，這些行動並未組織化。更值得注意的，是個人或群體與國家之間的「非對話狀態」(non-conversation)，也就是個人在體制縫隙中，試圖用低調而難以察覺的方式，完成自己的目標。面對無所不在的黨國體制所發展出的這種應對方式，也就是 Michael Szonyi 所說的「被治理的藝術」(the art of being governed)。<sup>17</sup> Szonyi 認為，這種所謂藝術，作為一種和統治權威共存的方式，從 14 世紀明朝以來便顯現在中國一般大眾當中，絕大多數中國人既不是堅決對抗政府的異議人士，也不是徹頭徹尾奴顏婢膝的順民。他們介於兩者之間——並不想積極對抗或推翻他們處於其中的國家，卻也樂於因應、甚至操弄國家政策，以滿足自身家庭與社區的利益。某種程度上，這就像筆者在加拿大公共服務學院（Canadian School of Public Service）擔任顧問時常常提到的：在今天的中國，若想在公共場域中安全生存，那麼每個人都得「學著用習近平的調門」，來唱出許多不同的歌曲和旋律。如果是一個西方人，觀察到中國人似乎都只有一種「正統語言」(orthodox language)，似乎與黨完全一致，不免會質疑，這是否表示大家都被洗腦或被壓服了。但其實這只是因為中國人都知道在公共場合該遵循何種言辭上的套路，而言辭背後的真正意涵，必須另外去解讀。

就筆者長期研究的中國知識分子來說，他們往往是透過所謂現代的「訓詁」學 (exegesis)，也就是對政策語言的詮釋，而在同一份「正統語言」下，提出極為多元的政策建議。毛澤東在 1960 年代初期就已看透這種策略。他稱這種策略為「打著紅旗反紅旗」（例如有些人表面上遵循正統的話語體系，但主旨是以毛不同意的方式去詮釋馬克思主義或列寧主義）。時至今日，情況依然，對於體制或政策有不同意見者，多半還是透過這種現代訓詁學，使用習近平的調門，

---

<sup>16</sup> Wenfang Tang, *Public Opinion and Political Change in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sup>17</sup> Michael Szonyi, *The Art of Being Governed: Everyday Politics in Late Imperial China*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7).

---

唱出不一樣的旋律。

那麼，在這次台灣與加拿大共同舉辦，環繞於中國大陸內政外交相關主題的學術會議中，本文所稱「認真看待意識形態」，對於與會學者的意涵為何？我希望，認真看待意識形態能有助於政策分析者與政策實務工作者，探究與中國互動當中，更有利於我們本身的方式。具體來說，首先，我們應將意識形態視為一個真正獨立的變數，而非僅僅視為一種「外在門面的裝飾品」（window dressing）、或是「話術」（spin）或「假訊息」（disinformation）。為了理解意識形態的力量，我在以上提出「大寫的意識形態（capital-I Ideology）」與「小寫的意識形態（small-i ideology）」之區分。如上所言，這是按照人類學家 Clifford Geertz 的論述而來，他將意識形態視為一種文化體系，在此概念下，可以說每個人都有一套意識形態，因為如果一個人什麼都不信，那這個人每天早上就沒有理由起床持續面對這個世界。換言之，意識形態是我們理解世界、賦予生活意義的方式。

舉個例來說，《紐約時報》總編輯的意識形態，當然與《人民日報》總編輯的意識形態不同；而「大寫的意識形態」背後還有一支軍隊在支撐。我不認為大多數人真正在乎習近平的「四個自信」、「五個那個」或「六個其他」這類口號；頂多，他們會覺得，政府說點道德話是應該的。但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小寫意識形態」，而習近平的政治思想本身，也同時包含了「大寫的 I」與「小寫的 i」。其中最顯著的「小寫 i」，就是「民族主義」，在這點上，當前中共已經取得一定成效。過去二十年，中共在意識形態上最大的成就，可能就是成功地將「國家」與「黨」綁在一起，讓大多數人相信：即便中共有許多缺點，仍沒有其他替代力量能夠維護中國的國家利益。因此，「公開挑戰共產黨」這件事，在多數中國人看來沒有意義。若我們能夠具備對中國「大寫 I」意識形態規範與價值，以及「小寫 i」在不同個體與社會群體中多樣運作的充分認識，就可以避免無謂的衝突，並找到最有效的應對方式。舉例來說：在中國，普遍存在一種期待，即：政府的言行和舉動，應該如同教會一樣從道德立場出發。中國政治講的是「價值」與「道德」，而西方政治（至少過去是）講的卻是「利益」。如果能在一個講「價值」，一個講「利益」的這兩種不同的「作業系統」之間搭起橋樑，那麼或許就能避免彼此誤解，也能清楚辨識哪些是根本性的衝突、哪些是可以協商的分歧、哪些則是雙方的共同利益。

其次，若我們能對「中國式意識形態治理」所產生的社會與政治現實進行深入分析，將更有助於我們制定自己的政策目標。如前文所述，中共領導層歷來都會在關鍵時刻與現實妥協讓步，並據此大幅調整政策：無論是在日本侵華期間，或是在大躍進失敗與中蘇分裂之後，都是如此。這表示我們必須理解當前中共所界定的「主要矛盾」（primary contradiction）為何，才能有效擬定我們的政策立場與策略。舉例來說，加拿大的政策分析者與官員近年觀察到，加中雙邊關係出現了明顯轉變，中國外交部正在展開一場擴大其魅力和影響的行動（charm offensive）。而驅策中共此一行動的「主要矛盾」，就是美中貿易戰與「圍堵中國」的政策態勢。

最後，基於我本人的研究專長，我無意在此提出相關的具體對策，但此情此景至少顯示出，若我們希望塑造出更符合加國本身利益的對中關係，最有效的方式可能不是接受中方所提出的各種主張，而是聯合其他自由民主國家，一起去改變既定的現實（change the facts on the ground）。當然，這裡的「現實」指的是經濟現實，而不是軍事現實，因為在 1914 年前那場軍備擴張所帶來的教訓已經告訴我們，軍事升級的後果往往不堪設想。

# 近期中日高層互動觀察

何思慎 / 輔仁大學日文系(所)特聘教授兼本暨日本東亞研究中心主任

- 日相石破主張「基於國家利益的現實性外交」，積極布局對美、中及俄羅斯的大國外交關係，以戰略互惠改善對中關係，企在美中之間創造左右逢源的條件，重開對俄外交以緩解北面的戰略壓力。
- 近期中國解除日本水產禁令，恢復日人赴陸免簽措施，全面恢復 2019 年後中斷的兩軍交流，為 2025 年中共總理李強訪日，及未來日相石破訪中作鋪墊，惟或受制於「川普 2.0」帶來的美中競爭白熱化，日本外交上將難以接近中國。

日本執政的自民黨 2024 年 9 月 27 日總裁選舉，石破茂在第二輪投票中逆轉高市早苗，在 10 月 1 日經眾參兩院指名為第 102 代首相。此次 9 人角逐自民黨總裁為史上為最，但實為黨內兩大山頭菅義偉及麻生太郎的黨內「造王者」之爭，其間不脫原黨內派閥勢力的合縱聯橫，岸田文雄首相的「解散派閥」為德不卒。岸田將黨及內閣交給石破將可延續岸田內政、外交布局，「新資本主義」為石破所承繼，「安倍經濟學」終將褪去。石破不背書安倍前首相的「臺灣有事就是日本有事」，或因領政日本須妥慎處理中日關係，與中國衝突非日本民意所欲。

## 壹、戰略互惠改善對中關係

石破茂上任 8 天就宣布解散眾議院改選，11 月 11 日經眾參兩院再度被指名為第 103 代

首相，組成第二次內閣，在少數內閣的困境中繼續領政日本。面對川普重返白宮，石破積極布局對美、中及俄羅斯三個大國的外交，因應國際政治的新局勢。石破於 15、16 日出席在秘魯舉行「亞太經合會」(APEC) 峰會，繼之轉往巴西，參加 18 至 19 日的「二十國集團」(G20) 峰會。

日本與美、韓將藉 APEC 舉行三國首腦會談，兌現去年大衛營會談的每年對話承諾，加固三方的合作，但川普素來對多邊框架興趣不高，美日韓的合作能否推進存在變數，美國總統拜登的外交告別秀形式意義大於實質。對石破而言，在儘速訪美與川普初會始為重頭戲，若無法妥善處理美日關係將難以維繫政權穩定。

在川普確定當選的第一時間，石破旋即致電川普，加緊摸索與川普的關係。石破表示，兩人確認儘早會面，並同意將美日同盟提升至更高水準。石破不諱言在強化美日同盟中，面臨提高分擔駐日美軍支出的「體貼預算」及美軍的威懾力和自衛隊的自主防衛能力的互補分工與協作等問題。

石破不忘川普在第一任期時強勢要求日本對駐日美軍的經費分擔，使 5 年為期的駐日美軍經費分攤談判卡關。2021 年 1 月拜登上任後重啟美、日談判，重視同盟關係的拜登未如川普獅子大開口提高 5 倍，雙方達成共識，自 2022 年度起 5 年間，日本須分攤約 1 兆 550 億日圓，平均逐年約 2,110 億日圓，年度支出微

幅增加僅 100 億日圓左右。但川普恐在下個 5 年期經費分攤談判時，要求日本兌現負攤大幅增至 4 倍以上。

根據美國國防部 2004 年發布的美軍經費各國負攤額度顯示，日本的比例為 74%，大幅高於韓國的 40% 及德國的 32%。日本向美國表達負擔過重，後來縮減至目前 2,000 億日圓規模。日本防衛省希望將經費性質從便於美軍駐紮，轉換為促進提升自衛隊與美軍的共同應對緊急事態能力。防衛省官員認為，此旨在將定位從「體貼預算」變革為強化同盟的預算談判。川普若執意提高日本的駐日美軍經費負擔，美日將生嫌隙，損及美日同盟的深化。

面對川普的「美國優先」，除駐日美軍經費分攤問題，日本亦無能幸免於川普的關稅戰，石破內閣須創造對美外交的槓桿，改善對中關係，至為關鍵。石破上臺之初即藉東協（ASEAN）首腦會談與中共總理李強會談，以「戰略的互惠關係」定位中日關係。日本國家安全保障局長秋葉剛男 4 日兼程訪中，拜會中共外長王毅，確認中、日將推進擴大共同利益的「戰略互惠」，雙方一致同意在包括外長在內的所有層級持續展開多層次對話。

石破外交除尋求近期訪美會見川普，亦藉 11 月中旬在南美秘魯舉行召開的 APEC 領袖峰會之機，與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首次會談，為恢復中國因福島核電廠廢水排海而暫停的日本水產進口臨門一腳，此為落實「戰略的互惠關係」之敲門磚。日本經產省 11 月 11 日表示，中國最快將在國際原子能總署（IAEA）架構下，2025 年初進入福島核電廠採集核廢水分析。

## 貳、日本企在美中逢源，緩和日俄關係

北京若順勢解禁日本水產進口，中日貿易可望恢復常態。在川普祭出貿易保護主義下，

日本尋求中國大陸市場商機，約 220 家日商參加在上海舉辦的「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雖說川普主政後，中美競爭將加劇，升高地緣政治風險，但日本不看淡中國市場，積極行銷新商品及服務。

中日不僅著手理順經貿關係，亦摸索建構戰略互信。日本防衛相中谷元 11 月 21 日在寮國永珍與中共防長董軍舉行會談。中日常態化高層對話為雙邊關係轉正的訊號，陷入少數執政困境的石破茂試圖展現外交手腕在美、中之間創造左右逢源的條件，爭取民意的支持，備戰明年夏天決定內閣存亡的參議院選舉。

為應對「川普主義」，石破不僅修好中日關係，亦重拾日俄關係。石破表示，解決領土問題、與俄羅斯締結和平條約的路線不變。前首相岸田文雄在俄烏衝突中，完全站隊烏克蘭，使「安倍外交」所創造的日俄友好歸零，日俄關係處於 1956 年建交以來的低點，石破須重開對俄外交，緩解北面的戰略壓力。

俄羅斯總統普丁 11 月 7 日談及俄日關係時表示，「未對日本做不好的事」，無法理解日本為何制裁俄羅斯，若日本回歸合作軌道，俄羅斯不會拒絕。普丁對石破改善日俄關係的期待，溢於言表。日本與中、俄存在安全戰略矛盾，石破出席自衛隊組建 70 週年觀閱式，譴責中、俄軍機侵犯領空，但此不意味在外交上與之對抗，而是強調對話的重要性。面對激烈變動的國際格局，石破修正岸田的對美傾斜路線，多邊化日本外交。

## 參、中日從「對立」轉向「合作」，但受「川普 2.0」影響

習近平在秘魯「習石會」指出，「中日關係處於改善發展的關鍵時期」，中國願同日本「共同努力全面推進中日戰略互惠關係」。石破則表示，「將減少難題與尚未解決的問題，增加協作與合作」。石破表態將日中關係從「對立」轉向

「合作」。為營造日中和解氣氛，雙方將積極解決因福島核廢水排海衍生的中國禁止日本水產品進口問題。

石破在會談後表示，「習主席本人提及將達成的共識轉化為行動，此為十分重要的表態」，兩人決定將實施外長互訪及部長級的「日中高級別人文交流磋商機制」與「日中經濟高層對話」，藉頻繁溝通和往來，共同致力於減少難題與懸而未解的問題，全方位深化日中關係。石破化被動為主動，不斷向北京伸出橄欖枝，傳遞改善日中關係意願。

川普重返白宮，全球貿易戰升溫，關稅保護主義或將阻斷全球化的進程，但日本大企業並不看淡日中經貿關係。在人工智慧（AI）、半導體及碳中和等領域，松下副社長本間哲朗認為，日中應成為強大的供應鏈夥伴。面對中國的技術力，日本在避風險之餘，亦須抓機會，開拓中國市場，推升在創新領域的技術，而非與中國脫鉤斷鏈，創造擺脫日本結構性經濟衰退的條件，使日本國民感受到石破的「新資本主義」所言不虛，否則石破政權恐以「短命內閣」告終。

雖有許多布局傳統製造業的日企因工資成本上漲撤出中國市場，但在中國至今仍有 3 萬家日企，為數全球之最。日商艾爾斯半導體（RS Technologies）社長方永義認為，認為日本企業不應輕易撤離中國，中國作為消費市場，仍具巨大吸引力。對日本而言，一衣帶水的中國，不論從經貿或安全的視角，皆較與歐美的關係更為重要，日本不存在放棄中國巨大市場的選項。

日本商界年來不斷呼籲北京對日恢復免簽，但囿於岸田內閣對美傾斜的外交政策，在中國的免簽國家中始終未見日本，意味日中關係仍未走出低迷。石破上臺後，積極佈局日中關係，以「東協加 3」會議開局，會見中共總理李強，突出政治啓蒙恩師田中角榮，營造關

係改善的氣氛。

「習石會」後，北京順勢恢復對日本人免除短期入境簽證的措施，明年日本觀光客及商務人士得享免簽入境中國 30 天，此舉對恢復日中民間交流往來至為關鍵。中國解除新冠防疫封控後，日本人因遲遲未獲得免簽待遇恢復，降低赴中觀光及商務差旅之意願，為日中關係帶來負面影響。

繼「習石會」，日本防衛大臣中谷元 11 月 21 日與中共防長董軍在寮國永珍會談，兩人同意推進雙方防務部門間的對話及交流，並善用去年 5 月啟動的「海空聯絡機制」熱線，全面恢復 2019 年後中斷至今的日本自衛隊與中共解放軍之間的交流。在董軍與中谷元會談前，北京承認 8 月共軍軍機因氣流影響，操作失誤，誤入長崎縣男女群島近海的日本領空。中方解釋此為技術問題，而非故意進入他國領空。北京的說法，日本雖未完全接受，但足為日中的防長對話創造條件。

日中藉防長會晤、推進部門溝通管控東海風險；而恢復人員往來，除滿足中國招攬外國遊客、緩解經濟疲軟態勢的需求外，亦能對過去一段時間，兩國民間相互敵視，起到降溫的效果。在日中韓關係趨向和緩下，2025 年「日中韓峰會」可望順利召開，日本為下屆輪值主辦國，李強可能將循例出席峰會並順道訪日。

自 2018 年以來，受新冠疫情影響，中共總理尚未訪問日本，李強訪日為重啟日中「首腦外交」的契機，打破岸田內閣時期日中首腦未能互訪的閉塞感。在「習石會」中，石破表達訪中的積極意願，以推進日中關係「重回正軌」。若李強訪日，石破應有機會繼安倍 2018 年訪中後，再造訪中國，但陷入「少數內閣」困境的石破能否通過 2025 年 7 月參議院選舉的民意考驗是最大的變數，若執政無法長期化，難以為日中關係留下具體成果。

石破外交的起手式在日中關係雖有所斬

獲，但日本外交仍首重對美關係，石破當務之急應是與川普建立關係，打開對美外交。不善社交、不打高爾夫球的石破茂遠不及故前首相安倍晉三的長袖善舞，未來如何與川普交心，在「美國優先」下維護日本國家利益須待觀察。倘若美日政府間的溝通不順暢，為取信於華府，東京很可能在對中互動上會有所遲疑，侷限日中關係的改善空間。

然而，日本北海道大學國際關係學者遠藤乾認為，當年日中加強合作乃因美國「愈來愈不可靠」，中國須將出口多元化，而日本亦捉住中國爭取擴大出口市場的商機，為「安倍經濟學」注入動能。

戰後的日本外交以美日同盟為根基，日中關係只能被「工具化」為日本操作美日關係的槓桿，但「川普 2.0」恐將使美中競爭白熱化，日本屆時想左右逢源遊走在美中之間難度極高。若「川普 2.0」點燃美中在印太安全戰略的全面性對抗，日本在外交上將難以接近中國，而日本亦將失去對川普議價的空間。

## 肆、中共恢復日人短期免簽因應「川普 2.0」

中共 11 月 22 日宣布自 11 月底起恢復日本人入境中國的短期免簽，且可停留天數將從過去的 15 天延長至 30 天，以此擴大中日往來的人流。日本認為，北京重啓日本人赴中旅行的短期免簽，乃著眼於川普重返白宮的因應措施。

川普重啓「交易外交」，不僅將使自由貿易體制再次倒退，動搖多邊經貿合作框架，亦可能使中美關係進一步惡化。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 11 月中旬赴秘魯及巴西出席亞太經合會（APEC）及「二十國集團」（G20）領袖會議期間，與印太及歐盟（EU）國家領導人舉行多場邊會談，呼籲共同反對貿易保護主義。

關稅在川普眼中無異是能迫使他國接受美

國的要求。川普預告 2025 年 1 月 20 日就職後將立即簽署總統令對中國與墨西哥、加拿大分別加徵 10% 及 25% 的額外關稅，以遏止合成毒品「芬太尼」及非法移民進入美國。川普視《美墨加協定》（USMCA）於無物，未來任何遭川普認定與美國存在問題的國家均難逃關稅。

川普首波以「芬太尼」及非法移民為藉口，對中國與墨西哥、加拿大祭出懲罰性關稅，但此三國均為美國重要貿易對手國。美國商務部的統計顯示，美國從墨西哥、中國及加拿大進口份額位列前三位，合計高達美國進口總額 4 成，川普此舉一石二鳥，在打擊非法之餘亦削減貿易赤字。川普醉翁之意不在酒，平衡貿易逆差應是背後的政治精算。

川普亦將影響日商對美出口，嚴重減損獲利，其中以美國市場為主力的速霸路、馬自達及三菱等車企的營利將大幅降低近 3 成，日本嚴陣以待。本田的副社長青山真二在 11 月 6 日的財報發佈會上表示，川普的關稅政策短期內將產生重大影響。美國是僅次於中國的全球汽車主要市場。2023 年日本向美國輸出汽車 148 萬輛，較 2022 年成長 16%，佔日本車出口比率的 34%，若加上以墨西哥為出口美國基地的豐田、本田與日產，影響勢將擴大。

面對川普的加徵關稅，日本不能坐以待斃。陷入少數內閣困境的石破茂首相在內政上難有亮點，將先在外交上尋求契機，遂將其置於重要政策伊始。石破茂 29 日在眾議院發表施政演說表示，將奉行「基於國家利益的現實外交」，日美同盟不僅使日本受益，美國亦得益，願與川普「坦誠討論，將同盟提升到新的高度」。美日同盟不是美國保護日本，而是美國印太區域戰略利益的實踐。

在對中外交上，石破直言主張應該主張的，並在可合作的領域展開協作，此即「基於國家利益的現實性外交」，可預見石破試圖扭轉岸田內閣時間偏「對抗」的中日關係，將之導

向「對話下的協作」，建構建設性、穩定的關係，在所有層面進行溝通。日本外相岩屋毅 2024 年 12 月已訪問中國，並與王毅舉行會談及舉行部長級「日中高級別人文交流磋商機制」。

2025 年亦將召開「日中經濟高層對話」，協調解禁日本水產品輸中及恢復進口日本牛肉並擴大進口日本稻米展開協調，使日本農水產品重返中國市場，以利振興日本地方經濟，此攸關 7 月日本參議院大選勝負關鍵的農業縣的選票流向。

面對川普的貿易保護主義，日中韓將重啓《日中韓自由貿易協定(FTA)》談判，以區域高品質的多邊自由貿易體制降低川普的懲罰性關稅造成的貿易減損，維繫日中韓的經濟動能。12 月 4 日，王毅在第 20 屆「北京－東京論壇」表示，中國始終將日本視為重要合作夥伴，中日經濟利益及產業鏈、供應鏈深度交融，雙方要珍視共同利益與合作空間，共同維護全球自由貿易體系及供應鏈穩定暢通，重啓中日韓自貿區談判，提升亞洲經濟一體化水準。王毅預告 2025 年在日本召開的「日中韓峰會」將重回推進《日中韓 FTA》的目標。

為求在美、中維持平衡，石破的對中外交表現積極，爭取全面恢復人員往來，日本人重獲短期免簽待遇為石破強化日中關係的重要成果。石破茂認為，日中關係的基礎，最重要的是兩國國民開展交流。日本將藉 2025 年大阪・關西世博會的機會，擴大中國觀光客到訪，相互提升親近感。日本交通公社(JTB)在聲明中期盼旅遊需求能夠復甦。日本航空及旅遊業將增加航班與擴大旅遊行程以迎接北京的免簽措施，日本外務省官員正面評價中日人員交流。

## 伍、結語

石破在改善日中關係之餘，亦配合拜登利用美國民主黨執政的最後時間加固美日韓的戰略安全合作。拜登指「重大政治變化」來臨，

期盼美日韓三國合作「永遠持續」，設立三邊合作祕書處，將對話機制實體化，不受領導人更迭影響，但此舉亦顯示，川普上臺後可能為同盟關係投入變數，石破須輔以外交避險操作，此為石破推進日中關係之動因所在。日中關係不僅是兩國間的互動，日本重視臺海和平與穩定不變，其影響溢出雙邊的範圍，牽動兩岸及東北亞的戰略格局。

# 中國科學技術史的回顧與前瞻

---

王良能 / 政治學者

《中國科學技術史》編輯者李約瑟是個很用心的學者，詳盡記載中國科學技術發展歷程，包含個別的科學技術、機械設備及工具，還註記可查證相關發明確切年代的書籍，並進一步比較分析同類技術在中國與歐洲出現的時間差異，藉此推論相關科技究竟是中國流向西方，還是西方流向中國，根據他的研究，十五及十六世紀中葉以前東西方科學技術交流是中國傳到西方，十六世紀末、十七世紀開始有些西方技術傳到中國，十八世紀中葉以後，科學技術開始轉變為西方傳到東方的常態。

基於上述科技發展史實，李約瑟提出兩個問題：第一，為何前現代社會中國科學技術如此發達？第二，為何進入現代社會後，中國會轉變成科學技術落後國家？不少學者試圖深入探究這巨大轉變的肇因，經驗在前現代社會是生產的核心，中國人透過試行錯誤發明新技術，所以中國人強調「不聽老人言，吃虧在眼前」，但是西方在十五及十六世紀先有科學革命，例如培根發明實驗法，科技發明由經驗變成主動實驗，透過密集實驗來增加發明的可能性，科學技術發明由經驗型發明轉變成實驗型科技發明，歐洲因此逐漸超越中國。十八世紀中葉歐洲出現工業革命，工業革命的特徵是紡織機、蒸汽機及鋼鐵的使用，科技變遷速度加快，但科技發明也有週期，西方國家的因應之道就是投資科技研發，讓技術不斷推陳出新，而這一切之所以可能是西方在十五、十六世紀出現科學革命，所以要回答中國科學技術在現代落後西方此一問題，就必須先回答中國為何沒有出現科學革命。

科學是系統化的知識，現代科技與傳統科技的區別在於現代科技用數學模型來表述自然現象的假說，現代科技再用實驗法來驗證假說的真實性，與傳統科技相比，現代科學的特徵不僅在於概念的變化，最重要的變化與進步在於方法，李約瑟認為中國的官僚體制不利於科研，傳統中國社會士農工商，商為四民之末，官方的重農抑商政策不利於科技發明，李約瑟並未深入探究，但實際上商人在唐朝就可參加科舉，甚至還可買官。韋伯也發現中國在明朝就有資本主義萌芽，但資本主義在中國卻未能進一步茁壯，韋伯認為差異在西方有新教倫理，余英時在《儒家倫理與近代商人精神》一書中批判韋伯的論述，儘管如此，李約瑟與余英時仍然沒有解開科學革命與工業革命為何沒有發生在中國之謎。

學者文一提出蒙古人將中國的火藥及大砲科技帶到歐洲，引發歐洲的軍備競賽，曠日持久的戰爭席捲歐洲，科學技術應用於戰爭，然後擴及民用科技，各國為了生存全力研發火藥及砲彈技術，直接激發基礎物理與化學原理發展，牛頓與伽利略都是當時軍工廠首席科學家，法國的拉瓦錫也是皇家火藥研究員。中國是大一統帝國，沒有鄰國的挑戰，擁護朝廷的官僚利益集團在明朝排擠了實業階層，路徑依賴導致自大及科技不能持續進步，也低估了西方的挑戰，這就是學者文一認為科學革命及工業革命沒有發生在中國的主因。

但筆者認為科舉制度才是中國未能發生科學革命與工業革命的重要原因之一，隋朝開科取士，透過科舉選拔官員，宋朝以後四書五經

是考試的教科書，前現代的中國對於讀書的評價是「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社會上的英才都熱衷於科舉，雖然在科舉實施之初也考數學，但皇帝發現數學對於他的統治沒有幫助，所以廢考數學，有人做過統計，僅四書五經的字數就有四十多萬，要倒背如流，假設每天背 200 字，而且背後不會忘，也要六年多才能把四書五經熟背。此外，還要讀歷史、學作詩，明朝後還要學做八股文，所以古人需十年寒窗苦讀其來有自，就算考生一舉中第，還要在官僚階層一層一層往上爬，努力成為統治階層，社會也以儒家為道德權威，平民在承平時不必造反，可經由科舉成為統治階層，但是前現代歐洲沒有官僚體制，貴族採世襲制，而且歐洲

各國長年征戰，導致各國間科技交流加速，因此西歐比中國更有條件讓科學革命與工業革命萌芽茁壯。

一個在特定技術與物質條件下很優越的科舉制度，在路徑依賴下，在其他條件就可能成為社會進步的障礙，宋應星在《天工開物》一書中就勸想當官的人不要讀他的書，因為整個社會有一套由科舉衍生而來的價值觀，這是中國能維持大一統的原因之一，也是不利於科學革命及工業革命的重要原因，同時也是中華民族傑出偉大詩詞曲作家特別多的原因之一，但是台積電、華爲、字節跳動、deepseek 再度顯示，一旦脫離死背四書五經，中華民族追求科技的能力絕不下於任何民族。

## 讀者來信

本欄歡迎讀者來信，就有關大陸研究與教學發表意見、評論，或分享體驗。我們希望通過本欄為這方面的交流開闢一些空間，故不考慮人身攻擊或不帶反省性質的情感發洩。來信請提供真實姓名及通訊地址。編輯保留選稿及剪裁的權利。來信請寄 106 臺北市大安區羅斯福路四段一號 臺灣大學政治學系「中國大陸研究教學通訊編輯委員會」收。



## 徵稿啟事

本通訊歡迎關於中國大陸研究及教學方面的稿件。包括課程設計、教學心得、研究札記、各單位的活動簡訊、新教材或研究資料的引介、正在進行的研究計劃、及時問題討論等與中國大陸教學研究相關的課題。文長以三千字左右為宜，不須註解，並書明投稿人姓名、工作單位、職稱、聯絡地址與電話。來稿請寄 106 臺北市大安區羅斯福路四段一號臺灣大學政治學系，或傳真至 02-2365-3433，或將電子檔案傳送至 [politics@ntu.edu.tw](mailto:politics@ntu.edu.tw)「中國大陸研究教學通訊編輯委員會」收。

---

## 活動紀實

# 第八屆 【後西方國際關係：全球南方與關係理論】冬令營

周 燕 / 臺灣大學政治學系博士候選人

2025年1月10日至11日，第八屆後西方國際關係冬令營於國立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舉行。本次冬令營以「全球南方與關係理論」為核心議題，由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中國大陸

暨兩岸關係教學與研究中心主辦，邀請多位知名學者共同參與討論。此次冬令營不僅深化了全球南方研究，也為後西方國際關係理論的建構提供了新的思考維度。



## 跨越地理藩籬： 全球南方的集體性重探 ——2025年冬令營紀要(一)

本次冬令營邀請到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石之瑜教授，以「全球南方的集體性」為題進行專題演講。石教授從歷史脈絡、理論創新和現實意義等多個面向，深入剖析了全球南方的本質特徵，為與會師生帶來全新的研究視角。

石教授首先挑戰了傳統的全球南方概念。他指出，將全球南方簡單等同於「開發中國家」或「第三世界」的理解方式存在明顯局限。全球南方並非一個靜態的地理概念或發展階段的指標，而是一種基於共同歷史經驗和結構性處境的歸屬感所形成的「關係性網絡」(relational network)。這種歸屬感源自殖民統治的歷史創傷，體現為一種「受難關係 (relation of suffering)」。

在論述全球南方的集體性特徵時，石教授提出了「不可預測的集體 (unpredictable collective)」這一概念。他強調，全球南方的集體性並非持續穩定存在，而是在特定歷史時刻、透過情感觸發被喚起。這種集體性的特殊之處在於其自發性與即時性，往往在面對共同壓力時展現出意想不到的團結。

石教授特別指出，全球南方內部存在著語言、宗教、文化等多重差異，這些差異使其難以形成如北約或歐盟般的制度化組織。然而，正是這種差異性與某種程度的分裂狀態，反而強化了其作為一個「不可被領導」群體的特性。當遭遇霸權壓迫時，這種鬆散的結構關係反而成為其抵抗霸權的重要資源。

關於中國與全球南方的關係，石教授提供了深刻的政策反思。他認為，中國的全球南方政策既有先進性也有盲點。一方面，中國在「全球南方」概念形成前就積極與前殖民地國家建立關係，但另一方面，忽略了全球南方在中國內部的存在，以及對前殖民地國家的政策過於依賴經濟援助而忽視了援助資源的分配失衡與政權更迭帶來的戰略風險。

本次演講不僅為全球南方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論視角，也為理解當代國際關係提供了重要啟發。石教授強調，研究者應該更多關注情感因素在國際關係中的作用，重視非制度化合作的價值，並在理論建構中納入更多非西方的思考視角。這些觀點對於深化我們對全球南方的理解具有重要意義。

透過本次冬令營的深入討論，與會師生不僅加深了對全球南方議題的認識，也對國際關係研究的方法論有了新的思考。石教授的演講為後續研究開闢了新的路徑，也為促進中國與全球南方的互動提供了富有建設性的建議。

## 從多元主義到多元普世： 文明共存的新視野 —— 2025年冬令營紀要(二)

本次冬令營第二場講座邀請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石之瑜教授，就「文明倡議與多元普世

主義 (pluriversalism)」的議題展開深入探討。石教授從理論批判出發，逐步闡述了多元普世的本質與實踐價值，為理解當代文明共存提供了創新的思考框架。

石教授首先指出了多元主義 (pluralism) 作為國際關係理論框架的根本局限。他認為，多元主義過於強調文明的「代表性」，將不同文明視為獨立單元，這種抽象的包容無法解決文明間實際的共存問題。更重要的是，多元主義植根於新自由主義秩序，其個人主義方法論忽視了文明之間關係性的形成與維繫。

在闡述多元普世主義時，石教授以全球南方為例，指出其集體性源於殖民歷史形成的「受難關係」，這種基於共同經驗的情感聯結，往往在特定事件中被觸發，形成獨特的團結模式。石教授強調，全球南方內部的差異性不是阻礙，反而體現了多元普世的本質特徵。

石教授特別強調了多元主義與多元普世的根本區別。多元主義試圖透過「代表」(representation) 處理差異，但這種方式只能實現表面的包容。相比之下，多元普世主義關注文明在具體場景中如何透過接觸、學習與調整達成共存，強調的是一種動態的、關係性的過程。

對於中國提出的「文明倡議」，石教授提出了獨特的看法。他指出，當前的文明倡議仍囿於「文明彼此陌生」的假設，這與多元主義的框架相似。他建議文明倡議應該更多關注多元普世的實踐邏輯，透過研究文明在日常生活的具體交融來實現真正的互鑑與共存。

石教授以印尼的宗教共存和香港的一國兩制為例，說明了多元普世的實踐特徵。他強調，文明間的共存涉及學習與反身學習 (learning and unlearning) 的過程，是透過持續接觸與實踐自發形成的結果。

本次演講不僅深化了與會者對文明共存議題的理解，也為推進文明對話提供了新的思考方向。石教授的論述表明，探索多元普世的實踐價值，或許是超越當前國際關係困境的重要途徑。

---

## 碩博士論文資訊

# 112學年度碩博士論文

東吳大學 政治學系

論文 / 大綱	題 目	作 者	指導教授	通過日期
博士論文	The Study of ASEAN's Resilience and its Impacts on the Evolution of ASEAN Way and ASEAN Centrality: Rhetoric vs Reality	陽 宗 道	劉 必 榮	112學年

東海大學 政治學系

論文 / 大綱	題 目	作 者	指導教授	通過日期
博士論文	中共政治協商之研究：融合模式的統戰策略	任 立 丞	郭 應 哲 洪 耀 南	112學年

淡江大學 外交與國際關係學系中國大陸研究碩士在職專班

論文 / 大綱	題 目	作 者	指導教授	通過日期
碩士在職專班論文	中國科技自主創新政策之研究	吳 宗 振	李 志 強	112學年
碩士在職專班論文	論海峽兩岸刑法之異同	陳 聰 明	張 五 岳	112學年
碩士在職專班論文	我國半導體產業發展與戰略地位分析 －以美中科技戰為例	馮 怡 婷	張 五 岳	112學年
碩士在職專班論文	兩岸銀髮商機與長照政策比較	周 明 螢	張 五 岳 黃 明 發	112學年
碩士在職專班論文	馬英九時期兩岸共同打擊犯罪與司法互助之研究 (2008-2016)	劉 盛 良	潘 錫 堂 李 志 強	112學年
碩士在職專班論文	半導體產業在全球化進程中所面臨的挑戰： 美國、台灣和中國領先企業的案例研究	謝 宜 穎	李 志 強 蔡 青 蓉	112學年
碩士在職專班論文	習近平時期中國大陸出版業的發展與困境之研究： 兼論兩岸出版之比較	王 子 芬	潘 錫 堂 李 志 強	112學年
碩士在職專班論文	蔡英文時期陸客來臺觀光對我國影響之探討	陳 建 榮	潘 錫 堂 郭 展 禮	112學年
碩士在職專班論文	自媒體發展對兩岸輿論交流之影響	林 正 國	李 志 強	112學年

淡江大學 外交與國際關係學系中國大陸研究碩士班

論文 / 大綱	題 目	作 者	指導教授	通過日期
碩士論文	比較大灣區在前海深合區、橫琴深合區的發展	鄭 珮 恒	張 五 岳	112學年
碩士論文	台灣 Z 世代政黨青年看待中國對台文攻武嚇的印象： 以裴洛西訪台及蔡麥會後續效應為例	黃 予 瓔	張 五 岳 洪 耀 南	112學年
碩士論文	《實業計畫》的鐵路構想與現今中國大陸鐵路建設比較研究	李 嘉 和	李 志 強	112學年

### 中國文化大學 國家發展與中國大陸研究所中國大陸組

論文 / 大綱	題 目	作 者	指導教授	通過日期
碩士論文	在臺大陸配偶運用電子商務創業之歷程研究	王湘姿	姚蘊慧	112學年
碩士論文	從新功能主義觀點論兩岸棒球交流合作發展之可行性	陳佩妤	李孔智	112學年
碩士論文	大陸台商自動化的經營策略－以成衣產業為例	秦世興	李孔智	112學年
碩士論文	郵票析論近現代中國的政經變遷(1878-1949)	凌于鈞	李炳南	112學年
碩士論文	女性大陸配偶社會資本與創業經營之研究	張曉慶	姚蘊慧	112學年
碩士論文	習近平時期對臺政策(2012-2022)： 以歷史制度論分析	葉聖平	劉性仁	112學年

### 中國文化大學 國家發展與中國大陸研究所國家發展組

論文 / 大綱	題 目	作 者	指導教授	通過日期
碩士論文	從社會認同理論分析兩岸關係中文化認同之研究 －以南投縣陸配為例	史雪燕	劉性仁	112學年

### 中國文化大學 政治學系

論文 / 大綱	題 目	作 者	指導教授	通過日期
碩士論文	天地會的結構與功能研究：R. K. Merton 理論的應用	何俊元	林忠山	112學年
碩士論文	滿漢全席之政治文化研究：融合的觀點	梁幼祥	林忠山	112學年
博士論文	「一個中國」意涵的思辨 －美中台領導人在兩岸關係講詞中的語意分析	蔡芳曼	歐陽新宜	112學年

### 中央大學 法律與政府研究所

論文 / 大綱	題 目	作 者	指導教授	通過日期
碩士論文	論資安行政法人制度之合適性 －以國家資通安全研究院為例	江欣祐	許雲翔	112學年

### 中興大學 國家政策與公共事務研究所

論文 / 大綱	題 目	作 者	指導教授	通過日期
碩士論文	地緣政治風險對外來直接投資的影響 －以東亞新興國家為例	蔡明宇	邱明斌	112學年

### 成功大學 政治學系

論文 / 大綱	題 目	作 者	指導教授	通過日期
博士論文	中國大陸珠三角大氣污染府際協力治理機制研究 －制度性集體行動(ICA)理論的觀點	韋朝毅	丁仁方	112學年
博士論文	中國城市老人照顧服務體系優化研究： 整合照顧治理策略之應用	劉靜	宋鎮照	112學年

---

### 成功大學 政治學系碩士在職專班

論文 / 大綱	題 目	作 者	指導教授	通過日期
碩士專班 論 文	海峽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FA)對台南關廟麵產業之影響分析：以長安製麵廠為例	陳心瑜	周志杰	112學年

### 成功大學 政治學系

論文 / 大綱	題 目	作 者	指導教授	通過日期
碩士論文	東南亞獨角獸發展的政治經濟： 政府－市場－企業的三角分析	陳柔瑄	宋鎮照	112學年

### 成功大學 政治學系碩士在職專班

論文 / 大綱	題 目	作 者	指導教授	通過日期
碩士專班 論 文	新冷戰時期美中俄三角關係變動之研析	邱川璋	周志杰	112學年

### 佛光大學 公共事務學系

論文 / 大綱	題 目	作 者	指導教授	通過日期
碩士論文	兩岸新興毒品犯罪氾濫成因及防制對策之研究： 以毒品愷他命為例	陳特龍	陳尚懋	112學年

### 東華大學 公共行政學系

論文 / 大綱	題 目	作 者	指導教授	通過日期
碩士論文	香港民主化發展歷程及其影響之研究	吳俊霖	朱鎮明	112學年

### 南華大學 國際事務與企業學系亞太研究碩士班

論文 / 大綱	題 目	作 者	指導教授	通過日期
碩士論文	從俄烏戰爭反思西方在兩岸衝突中的支持	劉明雄	楊仕樂	112學年
碩士論文	新型態社會運動、反送中、反年改、與第一線執法者的認知：以保一總隊為例	林以翔	楊仕樂	112學年

### 國立臺北大學 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碩士在職專班

論文 / 大綱	題 目	作 者	指導教授	通過日期
碩士專班 論 文	海峽兩岸情勢演變對海基會角色功能影響之探討： 1991-2024	彭雯漪	陳金貴	112學年

### 中央警察大學 水上警察研究所

論文 / 大綱	題 目	作 者	指導教授	通過日期
碩士論文	海域執法使用低致命武器規範之研究	魏宏哲	姜皇池 陳國勝	112學年

## 中國大陸研究教學通訊 第 153 期

Mainland China Studies Newsletter No.153

<https://politics.ntu.edu.tw/?p=24994>

發 行 者：臺灣大學政治學系

贊 助 者：中華民國大陸委員會

榮譽主編：石之瑜（臺大政治學系名譽教授）

主 編：黃曼華（臺大政治學系教授）

執行編輯：徐斯勤（臺大政治學系教授）

編 委 會：黃曼華（臺大政治學系教授）

                徐斯勤（臺大政治學系教授）

                陳世民（臺大政治學系副教授）

                廖小娟（臺大政治學系副教授）

                蘇翊豪（臺大政治學系助理教授）

編輯助理：陳聿伶、黑迪文

地    址：106 臺北市大安區羅斯福路四段1 號

電    話：886-2-3366-8450

傳    真：886-2-2365-3433

印 刷 者：翰蘆圖書出版有限公司

電    話：886-2-2382-1120